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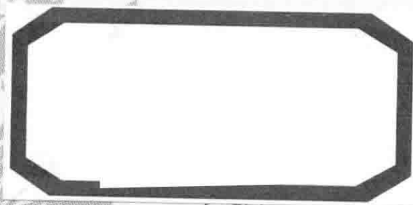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代、问题与批判

陈爱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hilosophy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代、问题与批判

陈爱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问题与批判 / 陈爱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7-5203-0994-3

I. ①第…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②第二国际—研究 IV. ①B0-0②D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30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75
插 页 2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系列实践与理论上的难题：如何判断资本主义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理论境遇？如何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认识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这些问题是第二国际重新审视革命道路和制定斗争策略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问题。第二国际主流理论家对这些问题的多维度阐释既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

陈爱萍，女，1976年生，安徽宣城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

责任编辑：冯春风

封面设计： 大鵬設計
010-81574649

序

王南湜

当马克思写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论断时，一种与以往哲学全然不同的理论存在方式便来到了世界上。“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意味着理论归根到底是以被付诸实施为目的的，这就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然而，理论要求普遍性、确定性，而现实生活却往往变动不居，这就必然要求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调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如何调整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二国际（1889—1914）时期是首次遇上了现实生活的重大变化时期，因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便极为突出地展现了出来，使得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得不对之做出自己的回应。毫无疑问，这些回应往往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并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无论如何，坚持或者偏离，都是其时理论家们面对变化了的现实生活而做出的回应，因而认真研究这些回应方式，找出其理论上的合理或不合理之处，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汲取经验教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但遗憾的是，百多年来，尽管对第二国际的研究资料已经很多，但对于其哲学理论的系统研究却十分稀少。因而，在现实生活世界又面临重大历史变动之际，陈爱萍博士这部系统研究第二国际哲学理论的著作，也就显得十分及时和重要了。

—

既然理论与实践，或者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是第二国际

理论家们所遇到的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涉及到哲学史上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那么，为要理解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阐释，便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改变世界，因而其理论对象是改变世界的人的历史行动，而非以往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所指向的超验之物。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承接费尔巴哈，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当然，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他的活动是受限制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这就是说，一方面，这种创造或改变世界是有条件的，即受到制约的，只是对既有世界的某种改变，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无中生有，但另一方面，尽管如此，历史总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历史”自身把人当作自己的工具而自行发展的。

马克思的这一观念是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一发展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从某种超越的存在向现实的人的转变。但这一从思辨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之中却提出了一个在思辨唯心主义中不成问题的问题，那就是改变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思辨唯心主义那里之所以不成其为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活动主体是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是超越的无限者，是绝对精神，而外部世界不过是这一绝对者的异化，而非绝对的异己性存在，因而所谓创造历史就不过是这一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而已。显然，这种展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或改变世界，而只是绝对精神的一种内部变换。而现实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他所面对和要改变的世界乃是实实在在异在的，因而这种改变便决非自我展现，而是实实在在地对异在世界的改变。这样一来，要能够创造历史即真实地改变世界，就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须满足一个条件，即那一异在的世界本身是可改变的。若世界本身是不可改变的，即如决定论者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全然被决定的，所谓改变世界就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如果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自己哲学之目标，那么在逻辑上就必然要设定世界的可改变性为前提。到此为止，一切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又以各种方式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一种历史决定论，于是，矛盾便出来了：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明确宣布，他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不同处在于以改变世界为指向，另一方面，按照嗣后的各种历史决定论解释，改变世界又是不可能的。基于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解释，自第二国际以来，这一在马克思那里不成问题的问题便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人们不得不以各种方式来消除这一矛盾。而这些不同的消除方式，也就构成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类型。第二国际，苏联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范式。

改变世界与世界的可改变性问题，无疑与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即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但由于人的改变世界的活动不能还原为自由意志，故其间又有重大差别。自由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状态，因而自霍布斯以来的诸多哲学家便能够对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关系问题持一种兼容论的立场；而改变世界的实践作为一种客观的活动的非内在性，因而便不可能合理地在决定论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持一种兼容论的立场。在此意义上，这一问题只是那些把改变世界作为其理论之目标或至少目标之一的哲学所特有的问题。由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明确把改变世界作为其自身之鹄的，从而将改变世界与世界的可改变性问题极为鲜明地凸现了出来，因而此一问题可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核心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于亚里士多德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将改变世界视之为其实践哲学目标之一的，因而，毫不奇怪，正是他最先明确意识到改变世界与世界的可改变性之间的关系，从而考察了人的不同活动类型的性质与其活动对象的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其哲学中，人类活动被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

为对象”^①。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与创制又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实践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而创制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而与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将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实践和创制两类活动统一地称为实践不同，但无论如何，“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而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这样，从可变与不可变性来看，人的三种类型的活动对应的便是两种不同的世界。

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把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创制和实践都统称为实践的话，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活动类型相关，便存在着两个世界：一者是“可变事物”的世界，另一者则是“永恒的东西”的世界。显然，世界的可改变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与人的活动的不同类型相关联的。只有作为实践活动之对象的那一世界才是可改变的，而作为理论活动之对象的世界，由于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因而便是不可改变的。这样一来，世界的可改变性与不可改变性之间的对待，便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待对应了起来。由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被分配在“永恒的东西”与“可变事物”两个世界之中，因而便不存在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与世界的不可改变性之间的理论矛盾。当然，矛盾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被转移到了那些“永恒的东西”作为本原如何产生出作为现象的“可变事物”这一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上了。我们知道，这一问题规定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方向。但如果人们不再认可亚里士多德的二重世界理论，或构造出某种类似的二重世界理论，而将两个世界归结为一，则这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会浮现出来。而这便是自第二国际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

不同于纯粹的学者，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尽管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强调马克思的核心范畴实践，但他们同时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参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

与者、领导者，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现实实践问题，因而，他们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理论的决定论趋向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

在理论方面，尽管以科拉柯夫斯基之见，第二国际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因为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在这一时期停滞了。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直接继承人”是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里形成的，他们关心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代替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与此目标相关，如何与强势的自然科学相一致，并借助于科学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成为了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一点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考茨基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他说道，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础是纯粹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纯粹的科学”^①，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于纯粹科学之上的应用科学”^②。为此，考茨基特别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似性。他认为，“自然是一般，社会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特殊事例”^③。社会规律“并不与自然发展的规律相矛盾，而毋宁可以说是自然发展规律的自然继续”^④。因此，人类的发展以及动物和植物的发展遵从着相同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概括起来就是：“社会的改变和物种的改变一样都可归因于环境的改变。如果环境保持不变，这个环境里居住的有机体和社会组织也就不变。有机体和社会组织的新形态是由于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才出现的。”^⑤“对发展的冲击力，并不是个体的自发的首创能力，而是环境的变化”；“在变化中发动的因素只能是生活条件的变化”；“归根到底，发展只由环境的变化来决定”。他甚至认为，自然与社会共有的这一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进化论的“共同基础”^⑥。社会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

① 《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②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六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页。

③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33页。

④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六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5页。

⑤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五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6-337页。

⑥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26，37，

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成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①。考茨基对于自己思想中的进化论因素并不隐讳，他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时写道，“我很早就开始探索一种历史观，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历史观首先是与自然科学思想相联系的，并不是与经济学思想相联系的。当然，社会主义的文献很快就使我意识到了，经济因素的意义。随着我的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我也一步一步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但是我仍然保留着对于历史中的自然因素的兴趣，继续把历史的发展与有机体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为自己的方法因此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有所区别：“他们是从黑格尔出发的，我是从达尔文出发的。我所研究的首先是达尔文，后来才是马克思；首先是有机体的发展，后来才是经济的发展，首先是物种的生存斗争，后来才是阶级斗争”。考茨基也特别强调，这一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主张决定论的一般唯物主义相关联的，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一个巨大的世界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的，这个“巨大的世界观”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他们的历史观以前，“已经在哲学上达到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了”，他们的历史观就是从这种“十分确定的哲学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把他们的历史观称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因为这种历史观是从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里产生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②。

但这只是涉及到考茨基哲学历史观之理论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实践者，他又不可能持一种完全宿命论的立场。在这方面，正如麦克莱伦所指出的那样，“考茨基的政治观绝不是机械论的。他总是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而且甚至在列宁之前，就预示在列宁的‘从外部灌输阶级意识’理论中包含的一些东西……一个组织完备的党的经常性责任就是去传播阶级意识，并向无产阶级提供一种连贯的政治理论；而零敲碎打的改良主义主张是永远不够了。”^③ 问题是如果历史过程连同人的意志都是被决定的，则这种灌输从理论上看如何可能呢？考茨

① 转引自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②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22页。

③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基承认,“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不能没有道德理想,不能不在道德上憎恶剥削和阶级统治。但是,这种理想不可能从科学社会主义那里得到支持……科学只与对必然性的认识有关。”^①这样一来,考茨基所说的道德理想就只能是外在于历史观的东西了。而这就与其决定论的历史观在理论上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了。

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第二国际的另一位主要理论家伯恩斯坦那里表现得更为显著。伯恩斯坦曾自认为比考茨基同实际运动有更多联系的,而在理论造诣上远不及考茨基^②,因而对这一矛盾及其解决的表达就更为直白了一些。伯恩斯坦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把这一矛盾分配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两个分离的层面中予以化解。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而这种作为“纯粹科学”的唯物史观,“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任何过程发生时,都不会没有它的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后果,任何现象都不会没有它的物质原因。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一句话,“把唯物主义专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③这样一种主张“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宿命论,自然无以使灵活地应对现实状况的实践成为可能。但不要紧,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除了早期的这种独断的决定论之外,还有后期灵活得多的应用学说。前者是不变的“纯粹的理论”,而后者则是可变的“应用的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把纯粹科学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段,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应用科学的原理却是另

① 转引自麦柯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② 参见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③ 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外一种情况。这些原理可以取消，却丝毫不致震动基础。”^① 这样一来，他也就能够以“应用科学”的名义，把承认观念力量对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影响，且这种“观念力量”“不但是理智上的利益，而且是道德上的利益，因而它也固有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观念性”，这些与决定论相矛盾的东西，纳入到他的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中来了^②。而至于如何处理这一早期的“纯粹科学”与后期的“应用科学”之间的矛盾关系，伯恩斯坦则似乎试图求助于新康德主义。他写道：“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③ 这在其时新康德主义正在德国各大学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无疑是很自然的。

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感受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张力，但他们往往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将之含混过去，而并未试图以马克思的方式克服这一矛盾。诚如柯拉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著作中的很多重要范畴，如实践概念等，基本没有被提到^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是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里形成其理论的，他们关心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代替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⑤，主动行动的需要尚未达到迫切的程度，因而其理论便呈现出一种机械决定论占主导地位的“死板的教条”加折衷主义。

这一决定论与世界的可改变性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后来在苏联哲学中继续以相似的方式存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亦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建设时期，无产阶级创建新社会的行动时期已经过去，从而哲学也与之相适应而从列宁晚年的辩证法探索转回到类似第二国际的理论范式。苏联哲学当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教科书体系为代表。在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斯大林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 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② 参见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78页。

③ 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④ 参见柯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流》（英文版）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⑤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13-14页。

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斯大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这种“推广”在他那里极为简捷:“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但斯大林又指出,上述说法并不排斥思想、理论等“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①。但在决定论的条件下,这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从学理上看是如何可能的,斯大林并未说明,后来的教科书体系也一般地未给予合理的说明。于是,尽管苏联学界对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持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其理论体系的主导性倾向仍是一种与之类似的机械决定论。

第二国际以及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由于其正统地位,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机械决定论阐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理论后果,使得人们一般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这正如后来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主义迷信成为实践哲学最远播的形式,使实践哲学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丧失了相当的文化影响力,尽管它可能也赢得了不少普通民众和二流知识分子,但是这些人不愿开动脑筋,偏偏要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派头等等。”于是,“往往有这种情况,人们同历史经济主义作斗争,却以为在反击历史唯物主义。”^②

三

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哲学上的困境,还有必要提及与其机械决定论和折衷主义直接相对立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阐释方式,即以卢卡奇为开创者和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进路。

在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436、437页。

② 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页。

之间的战争，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并在其影响下，在1920年前后相继在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爆发了革命；但另一方面，当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机构的第二国际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能说明这种形势，各个国家的工人党甚至直接投身到帝国主义战争之中。这种情况表明，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阐释，以适应革命的需要。

面对这一问题，卢卡奇认为必须反驳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论、社会进化论和新康德主义，而论证革命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意识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特别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之际，人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便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革命没有按照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社会进化理论在西欧发达国家首先获胜，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首先获胜？一种最直接的解释便是这些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缺乏革命意识。而这种结果正是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说明革命意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种对于自发的革命意识或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和说明，在当时的许多重要理论家著作中都有体现，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无疑是理论上最深刻、最渊博、最系统的，因而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一点诚如麦克莱伦所言：“卢卡奇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是1917年十月革命，可以说他的著作是把这次革命理想化的理论。”^①

如果说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体系更多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式的阐释的话，那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则走向了黑格尔主义。卢卡奇本人并不隐讳其书中的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倾向：他反对那种“过高地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的观点，而以“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作为该书“许多论述的基础”^②。事实上，如果要超越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论与新康德主义哲学，作为康德主义对立物的黑格尔主义可能也是最易得到的理论武器了。因而如果我们比照黑格尔哲学的逻辑结构——“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③，

① 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81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页。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当能更容易地抓住《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理论逻辑^①。该书中最重要概念无疑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如果在此把“历史”理解为黑格尔哲学中“实体”概念的类似物，把“无产阶级”理解为历史的主体-客体，“无产阶级意识”便是一种类似于“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意识，即无产阶级对于自己历史使命的自觉，那么，我们就能够清楚地把握住《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逻辑结构。若从其理论逻辑的终点倒过来看，无产阶级意识作为阶级意识的最高体现，构成了该书的最高范畴，即其思想逻辑的终点；而为了证成“无产阶级意识”这一最高范畴，便须先确认或设定这一“无产阶级意识”的阙失即未自觉状态（否则论证便没有必要）；但未自觉需要一个根据，这根据便是“物化意识”，而物化意识的存在又是由于“物化”现象的存在。但物化之所以可能，又预设了一种非物化的前提，这便是“总体性”概念，所谓“物化”，正是相对于总体性而言的，是总体性的失落或失陷。这“总体”便是思维或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作为这一统一体或“总体”，便是“历史”。“历史”因此就构成了卢卡奇全部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或基础。

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物化了，但“那些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由于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必然是根本不同的”^②。由于陷入物化意识之中，“资产阶级的直观态度没有能力把握历史，这种没有能力分化为两个极端：一个是作为专横的历史创造者的‘伟大的个人’，一个是历史环境的‘自然规律’”^③。而由于阶级利益的推动，却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而达到对于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的认识，即意识到自己作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创世的‘我们’”。无产阶级并非一开始就能认识到自己是“行动的主体”，恰恰相反，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社会事件的纯粹客体而出现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是一个被简化为量的

① 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理论逻辑与黑格尔哲学逻辑的类似性，卢卡奇自己有过恰当的评价。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17~18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9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0页。

数码，是一个机械化了的、合理化了的零件”，而“这样一来，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表现形式的物化特征就被推到了极点”，“但正因此，他就被迫力求超越上述状况的直接性”。一旦“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这是意识不是关于他所面对的客体的意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意识这一行为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①。于是，“如果资本的物化被融化为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停的过程，那末在这种立场上，无产阶级就能意识到自己是这一过程的真正的——尽管是被束缚的和暂且是不自觉的——主体”^②。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意识达到了自觉。这种自觉决非仅仅是一种理论意识，而是一种实践意识，它必定会参与到改变现实的实践中去，从而推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实现。至此，卢卡奇便似乎完成了其全部理论论证，从理论上说明了主体能动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但是，卢卡奇这里所论证的主体能动性是否为一种真正的能动性，仍然是可质疑的。这里的根本问题仍在于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因为在卢卡奇的论证中，无产阶级之达到自我意识，并非无产阶级之内在的自发行行为，而是受控制于总体的历史性，只有在总体历史进展的某一个阶段上，由于被置于性命攸关之处境，无产阶级才被“推到了”自我意识之中。这样，无产阶级之自觉就仍然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而无关乎其自发性。这一点正如梅扎罗斯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把现存理解为变易’，并按照对其‘过程的’特征的正确理解‘发现它’——由于意识到意识的工作——就成了对现存的不增长的矛盾的理想化的解决。这样，《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整个事业就不得不仍然停留在黑格尔体系的某些重要范畴的局限之内。”^③ 其他强调主题能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大致上也仍在卢卡奇所开创的道路上行进。

因此，问题仍然存在。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4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68页。

③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